

第一章

人类早期的翻译活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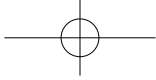
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几乎与人类历史同样久远。中国先秦时代就有翻译活动的记载，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上几种不同的文字，《圣经》中关于巴别塔（亦称通天塔）的传说，也都是上古时期不同语言间交际和翻译活动的印记。可以想象，人类先民尽管活动范围有限，但部落之间的偶然交往不可避免，口译活动，确切地说是早期的跨语言交际，也因此必不可少。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交往日益频繁，翻译活动也日显重要。一般说来，口译活动总是先于笔译活动，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字的出现比较晚，另一方面只有社会组织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才需要书面文件的翻译。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关于人类早期翻译活动的记载都十分稀少，今天我们只能从古籍中的只言片语和考古发现的零星物件中窥探远古时代人类的翻译活动。

第一节 中国汉代以前的翻译活动

中国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始于东汉末年的佛经汉译。至于汉代以前的翻译活动，史书记载很少，有些还是后世人补记的。

古籍中关于翻译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一部叙述当时官制的书《周礼》¹，其中《秋官》篇中提到：“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这里的“象胥”即指周代负责接待周边少数民族或邻国使节并担任口译的官员。根据《周礼》的说法，象胥之上还有大行人和小行人，他们的职责是“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比象胥职位低的还有上士、中士、下士和徒等，

1 《周礼》据说为西周时期周公旦（姬旦）所作，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



约 31 人，¹可见这个机构规模不小。《礼记·王制》中有一段话充分反映了当时周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及彼此之间翻译活动的概况：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可见周王朝史官自称“中国”，而把位于“中国”四周的其他民族分别称为夷、蛮、戎、狄，故而称“五方”。“中国”人与东南西北各民族的语言不同，为了相互交流，出现了专门翻译（主要指口译）各周边民族语言的人，翻译东方语言的人称“寄”，翻译南方语言的人称“象”，翻译西方语言的人称“狄鞮”，翻译北方语言的人称“译”。这些早期对译者的称谓一直流传下来，直到近代，人们谈论翻译人才时，还习惯称呼他们为“象寄之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籍中最初并无“翻译”一词，首先出现的是“译”字，直到佛经翻译时代，才逐渐与“翻”字连用。而且从《礼记》看，“译”字最初指担任翻译工作的人或职位，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一个动词。唐代学者孔颖达在为《礼记正义》所作的疏解中解释说：“其通传北方语言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对“译”字的内涵进行了扩展；而另一位唐代学者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对“译”字的解释是“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给出了一个即使从今天的译学眼光来看也堪称经典的翻译定义。

周代对译者的称谓，除了上述象胥、象、寄、狄鞮和译外，还统称“舌人”。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国语》也偶尔涉及翻译活动，“夫戎狄冒没轻儻（音 chán），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比之《礼记》，《国语》对“中国”之外的民族轻慢之态溢于言表，甚至称之为“禽兽”；戎狄来朝贡，正式见面前只有“舌人”来接待、敷衍。据三国时期吴人韦昭的解释，“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²“舌人”多指民间普通口译人员，而“象胥”是官方任命的正式译员。

中国古籍中关于翻译活动的只言片语还告诉我们，当时翻译多为外事口译。北宋时编纂的《册府元龟》把周代至北宋的外事活动按功能分为 9 类：册封、朝贡、和亲、通好、盟誓、纳贡、入觐、请求和互市，几乎每一类活

1 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3 页。

2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5 页。

动都与翻译相关。《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有“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等语，“于夷”和“方夷”等很明显是“中国”之外的民族，他们来朝贺中原君主即位，自然少不了翻译活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有这样的记载：“周公居摄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越裳国使者经过三次辗转翻译才得以和周公交流，这也许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外事口译活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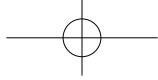
古籍中记载的绝大部分外事活动都是外族或外国人来中国，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箕子碑》则记述了一个中国人在外国进行翻译活动的例子。相传箕子本名胥余，是商纣王的叔父，封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世称箕子。箕子非常贤明，常常劝谏纣王施行仁政，纣王不但不听从，还把箕子囚禁起来。周灭商后，周武王将箕子释放，但他不愿仕周，逃亡到朝鲜，武王就将朝鲜分封给他。《箕子碑》里说他“及封朝鲜，推道训俗……俾夷为华，化及民也”。朝鲜史书《东国通鉴》的记载则印证了柳宗元的说法：“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既至朝鲜，言语不同，译而知之”。¹可见箕子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对外交流使者，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留名青史的翻译者。此外，《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等古书说周穆王西行至今中亚一带，西王母献歌一曲来欢迎，这些富于想象的传说当然不足为信，但也反映了远古时代中国人对外交流的愿望。张骞出使西域则是信史，他曾到达中亚多国。这些对外交流活动中，首要的就是翻译，否则任何交流都谈不上，遗憾的是史书对此惜墨如金，甚至只字未提。

除了外事口译，还有少量文学翻译。西汉刘向所编《说苑》之《善说》篇记载了楚国大夫庄辛讲述的一个故事：公元前528年，楚国令尹鄂君子皙举行舟游盛会，百官缙绅，冠盖如云。在盛会上，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一位懂楚语的越人给予皙翻译道：“今夕何夕兮？搴洲（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就是著名的《越人歌》，原文还有用汉语记录的越音，据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翻译诗歌。²

先秦以来的文献中的确有一些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载，但总体上记载既少又不详细，往往散落在史书中关于外交事务的篇章里，如《外臣部》、《蛮夷传》等。正史里胪列的相关资料多为翻译职官或朝贡表文，对具体传译过程鲜有提及，而译者的姓名几乎从未被提及。这些情况反映了古人对翻译问题的轻视态度。《国语》、《吕氏春秋》等书称译者（口译者）为“舌人”，称外族或外国语言为“反舌”，东汉高诱注释《吕氏春秋》说“夷语与中国相反，

1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2 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故曰反舌”，其轻慢之状跃然纸上。据说孔子也曾发表过关于翻译的言论，他和鲁哀公的对话中，称“翻译”为“小辩”，是国君不必亲力亲为的“小道”；至于外交事务，让译者来传言即可，非常简单，“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¹唐代大诗人刘禹锡（772-842年）在《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中写道：“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他所说的“翻译徒”可能指的是佛经译者，佛经翻译中一直有文、质两派，而担任佛经汉译者多为僧人，其文化水平当然不可能与大诗人相提并论。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东晋大诗人谢灵运（385-433年）可称得上“文雅雄”了，他就参与过佛经汉译，流传至今的《大般涅槃经》卷首标明“谢灵运再治”，抚州宝应寺也曾保留“谢灵运翻经台”古迹，只是历代文学史家对谢灵运的翻译家身份从来都视若无睹。²这些例子都说明，古人对翻译或译者的轻视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节 西方早期的翻译活动

西方关于翻译的起源充满了神秘色彩。《圣经·旧约·创世纪》有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代，人类操同样的语言，使用同样的词语。在向东迁徙过程中，他们来到一片平原，决定在那里定居。同时，人们商量建一座城，在城中造一座高塔，可以直达云霄。耶和华（上帝）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所造的塔很快就要到达天庭，于是决定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人们彼此语言不同，无法再齐心协力干一件事，从此人们四散各方。这座城市叫巴别（Babel），城里的塔叫巴别塔（Tower of Babel）。后世学者多借巴别塔的故事喻示翻译的起源及其与语言的关系。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则受惠于古埃及和近东地区的灿烂文化，其中翻译无疑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的最主要手段。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人完成了“象形文字”的创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也创制了一种“楔形文字”，由此可见这些地方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希腊人借地利之便（靠近小亚细亚），从古巴比伦人那里学习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从犹太人那里学习了神学，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建筑术，“这些文明成果通过翻译媒介教化了整个欧洲”。³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对这些翻译活动的情况却鲜有文字记载。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转引自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02页。

3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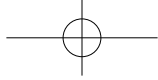
西方真正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始于《圣经·旧约》的希腊语翻译。《旧约》本是犹太教经典，主要用希伯来语写成（个别章节用阿拉米语写成），后来被基督教全盘接受。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命运多舛，常常被异族征服，被迫迁徙，四处流散。其中一部分希伯来人流落到埃及，聚居在亚历山大里亚。到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已经不会讲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而只会讲希腊语。为满足犹太社区的宗教需要，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菲请求耶路撒冷大主教艾利扎派遣懂希腊语的学者将《旧约》翻译成希腊语。据说艾利扎从12个以色列部落中各挑选6名学者到亚历山大里亚去翻译，这72名学者两人一组，分别在36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翻译，结果译文几乎完全一样。在英语世界，这个希腊语译文的《旧约》被称为 *Septuagint*（这个词源自拉丁文 *Interpretatio septuaginta virorum*，意思是“七十人的翻译”），汉语世界称之为《七十子文本》（亦称《七十贤士译本》或《七十子希腊文本》）。¹有意思的是，尽管基督教会历来声称72位学者的翻译结果一致，而且十分准确，事实上学者们的译文彼此差异极大，充斥着原文（希伯来语）的词汇与句法，是很糟糕的翻译。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七十子文本》的权威性，直到当代许多希腊教会还在使用这个版本，它还是地中海沿岸其他语言翻译《旧约》的底本。²

古希腊孕育过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最终还是被崛起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军事强国罗马征服，西方第一个翻译高潮也随之而来。罗马人在军事上十分强大，文化上却远逊于希腊，因此从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人就开始大量翻译希腊典籍，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

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公元前284-公元前204年）是罗马早期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也是罗马史诗和戏剧的奠基人。安德罗尼柯本是希腊人，后被罗马军队俘虏并卖为奴隶，主人欣赏他的才华而给了他自由。获得自由后，他在罗马以教拉丁语和希腊语为生，为了教学方便他进行了大量翻译。约公元前250年左右，他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赛》，译文采用的是撒图尼乌斯诗歌体，翻译方法是尽量使用罗马化的拼写，如将希腊神祇宙斯译成罗马人熟悉的朱庇特，将希腊文的赫尔墨斯译成罗马人的信使墨丘利，将缪斯换成卡墨拉，等等。用当代的术语说，他使用的是归化翻译法。安德罗尼柯翻译的《奥德赛》本身文学性并不强，然而这是第一部用拉丁语翻译的文学作品，也是第一首拉丁诗，其文化移植的方法不仅丰富了罗马文化，也是后代翻译家和文学家们学习的样板，影响十分深远。此外，安德罗尼柯还翻译和改编过希腊的戏剧作品，包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页。

2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in 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Pinter, 1990, pp14-28.



人的悲剧和米南德的喜剧。他编译的部分剧本被搬上一年一度的“罗马赛会”舞台，催生了罗马的舞台表演艺术。

涅维乌斯（Gnaeus Naevius, 公元前 270-公元前 201 年）是古罗马另一位翻译家和历史剧作家。他一生翻译创作了 6 部悲剧和 30 部喜剧。与安德罗尼柯的模仿式翻译不同，涅维乌斯常常把几出希腊喜剧组合起来，保留希腊戏剧的形式，内容却充满罗马特色，是一种混合戏剧。

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 公元前 239-公元前 169 年）被誉为“罗马文学之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他以创作《编年史》著称，但他翻译过希腊悲剧，并通过翻译把希腊的六步韵移植到拉丁文学中，对拉丁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了上述三位著名翻译家，古罗马著名的翻译家还有普劳图斯（Plautus, 公元前 254-公元前 184 年）、泰伦斯（Terence, 公元前 190-公元前 159 年）、卡图卢斯（Catullus, 公元前 84-公元前 54 年）和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 年）等，他们都或多或少翻译过希腊的史诗和戏剧。

古罗马人不仅掀起了西方第一个文学翻译高潮，同时也是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总结者。西塞罗不仅翻译过荷马的《奥德赛》、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色诺芬的《经济论》等文学和社科作品，还是第一位翻译理论家。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恶之定义》两部著作中他对翻译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声称自己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提出翻译中没有必要字字对应，只需要保留原文总的风格和力量即可。换言之，他反对字字对应的机械直译，赞成灵活的译法。他还主张翻译也是文学创作，应使用符合罗马语言习惯的语体翻译外来作品，以吸引读者。西塞罗讨论过的问题如翻译与创作、内容与形式、译者的职责与权力、“解说员”式翻译与“演说家”式翻译等，是此后将近 2000 年里西方翻译理论探讨的主要话题。¹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公元前 8 年，英语拼写为 Horace）是古罗马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和翻译理论家。在其名著《诗艺》中他提出：翻译和创作一样贵在创新，翻译家有权利去创造罗马人闻所未闻的新词；译文应该忠实，但不是简单忠于原文文本，而是要以目的语读者为尺度。² 他明确反对逐字对应式的翻译法，主张灵活的意义转换。³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35-95 年）是一位修辞学家，也对翻译问题有独到见解。他在《修辞学原理》中提出：翻译可根据内容分为一般材料翻译和创造性的翻译，前者如商业文本，后者如文学、哲学文本；他还提出应该区分“翻译”和“释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20-21 页。

2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82 页

3 Andre Lefevere, (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5.

义”，后者不仅适用于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也适用于拉丁语语内的解释和模仿；通过翻译，译者可以锤炼写作风格，可以与原文竞争，与原作媲美，因为翻译也是一种创作。¹

第三节 中东²地区早期的翻译活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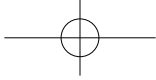
由于地缘、更由于文化上的渊源，中东地区与希腊、罗马的关系往往“剪不断、理还乱”，因此许多史书，尤其是翻译史常常将中东的历史放在“西方”的框架下叙述。我们认为，尽管中东与“西方”关系密切，但它毕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独特性，因此单列一节。

正如第二节所谈到的，某种程度上，希腊文明源自近东和中东，这些地区很早就有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很早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古亚述王国和古巴比伦王国是此区域的杰出代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就兴起了一个亚述王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该国国王供养了一大批精通数种语言的“书吏”，他们的任务是用各种语言把国王的丰功伟绩公诸于世，这也许是中东地区最早的翻译活动了。公元前19世纪，阿摩利人灭掉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建立了以巴比伦城为首都的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世纪初，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Hammurabi，约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即位，征服了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成为西亚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典型。汉穆拉比国王颁布了人类第一部成文法《汉穆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内容用楔形文字镌刻在黑色石柱上。由于古巴比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法典使用的是阿卡德语，国王命令译员把法典内容翻译给不同民族的人听，同时还要他们负责把其他政令翻译成各种文字，以传达给城邦庶民知晓。与此同时，另有一些译员还专门编辑了不同语言的词汇表，以方便翻译对照，类似于今天的双语或多语词典，由此可见当时的翻译活动是何等频繁。

《圣经·旧约》中的一些描述也反映了古代中东地区的一些翻译概况。《旧约·以斯帖记》第8章第9节说：“三月，就是西弯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着末底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实一百二十七省的犹太人和总督省长

1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2 19世纪末，西方部分地缘政治学者、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为区分西欧以东的国家和地区，炮制了一些关于东方的术语，包括近东（Near East）、中东（Middle East）和远东（Far East）。



首领。”¹ 国王的书记很显然是精通多种语言的人，他们能将国王的法令翻译成不同语言。《旧约·尼希米记》也有类似记载。尼希米时代（约公元前4世纪末），人们常常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广场上听人宣讲神的律法，有些听众听不懂，于是有一些人帮助翻译，“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² 为什么部分老百姓听不懂宣讲？因为“上帝的律法”是用希伯来语写的，而听讲的听众来自四面八方，那些来自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如埃及、巴比伦等地，他们早已忘记了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所以只好请译员用当时闪米特人做生意的通用语阿拉米语来解释。³ 圣经翻译史上《七十子文本》的产生，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是中东地区古代翻译活动的又一历史见证。1799年拿破仑率法国大军远征埃及，士兵们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镇发现了一块镌刻着多种古文字的石碑。据研究，这块碑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从上到下分别铭刻着三种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俗体文字和希腊文。经后世学者解读，石碑文字内容为埃及祭司们记录的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的丰功伟绩及一系列教令。罗塞塔石碑留给后世的悬念是：到底哪种文字是原文？哪种文字是译文？人们的回答可能见仁见智，但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时埃及是一个多语社会，翻译已经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

【小结与讨论】

翻译活动的直接起因是语言的隔阂，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人因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所以要通过翻译来“达其志，通其欲”；西方人则认为人类本来讲相同的语言，因为上帝担心人类修建的巴别塔威胁自己的地位而变乱人类的语言，才产生了翻译的需求。正史中与翻译相关的记载多见于外事活动，这也是翻译实用性的另一注脚。相比之下，西方人对翻译的看法则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形而上的思辨。“巴别塔”的传说不仅仅关乎翻译起源的问题。首先，它告诉我们古代西方人的翻译观，即翻译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这个观念影响深远，在当代仍然相当流行；其次，造塔与毁塔反映了人与神的对立和斗争，斗争的结果就是立约，规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巴别塔的故事又曲折地暗示了翻译问题绝不仅仅限于言辞，还涉及权力和伦理等问题；再次，这个故事还反映了古代西方人对语言大同的理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场“世界语”（Esperanto）实验出现在

1 《圣经》（新标准修订版），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年，第754-755页。

2 同上，第734页。

3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页。

西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¹ 不过，在翻译问题等于语言问题这一点上，中西古人的看法相差不多。

中外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述都十分久远，然而具体时间却很难确定。在中国如果按照《册府元龟》的说法“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推断当时就存在外交口译，那么中国在公元前 21 世纪就有翻译活动了。但这仅仅是推断，因为文献中并未直接提及翻译。真正记载翻译职官的是周代的史书，如《周礼》，从其作者周公的时代推断，中国最早关于翻译的记载当在公元前 11 世纪末。中东地区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述也十分久远，亚述帝国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就有“书吏”翻译王国诏令了。《旧约》也有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述，《旧约》中最古老的篇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3 世纪，因此可以说巴勒斯坦地区的翻译活动可以上溯至公元前 13 世纪。古希腊的翻译活动记载不多，但古罗马的翻译活动记载很细，大致从公元前 3 世纪开始，到公元元年前后达到一个高潮。

然而，尽管中国有记载的翻译活动似乎早于西方，但西方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载却比中国更加详细和系统。西方对翻译理论的总结不仅比中国早，也更全面。就翻译内容来说，中国先秦时期的翻译对象主要是外事活动的相关内容，译员往往是政府公务人员。西方早期的翻译内容除了宗教文献，还有大量文学、社科、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译员中学者居多。中国古代对译员十分轻视，因而很少能在史籍中发现译员的姓名和生平，而古代西方却不一样。古罗马的文学翻译家们受到无数人敬仰崇拜，他们的生平、著述和翻译作品成为历代学者研习的对象。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西方对译者的轻视也很严重，但往往是在与创作家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译者受到忽视甚至蔑视，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现象，这与自古以来人们仅仅把翻译理解为语言转换的技术性工作和语言工具论有莫大关系。

【思考题】

1. 早期中西翻译史有何同异之处？
2. 中国古籍中为何对翻译活动的直接记述十分稀少？

1 何绍斌，《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4页。